

全民参与的“除四害”运动



20 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举国上下开展了以“除四害”（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，1960 年后以臭虫取代麻雀）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。说起“除四害”，亲历过的人应该都有难以忘怀的记忆：清晨，大家拿着长竹竿、汽枪等爬上房顶，手执旗子、扫帚吆喝着，敲打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；家家户户用开水灌老鼠洞；用六六粉熏蚊子；集体去厕所、菜场等场所扑灭苍蝇……这场运动不仅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，也给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卫生制度贴上了鲜明的时代标签。

本文作者 闫树军
《炎黄春秋》编辑出版

因反细菌战兴起

“苍蝇蚊虫传疾病，老鼠麻雀偷食粮，六万万人民齐上阵（喂），一定要把它们消灭光！”这首歌谣描述的便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“除四害”运动。

很多人认为“除四害”是 1958 年“大跃进”的产物，其实不然，早在 1952 年，“除四害，讲卫生”就开展起来了。朝鲜战争中，美国实施细菌战，带毒昆虫也洒落到了我国东北地区，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。对此，中国政府严重抗议，并于 1952 年 3 月 14 日的政务院第 128 次会议上，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，后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，周恩来总理任主任，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。由于这个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美国的细菌战争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，中央就把这个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。

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毛主席“动员起来，讲究卫生，减少疾病，提高健康水平，粉碎敌人的细菌战”的号召，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。这为之后更大规模的“除四害”运动奠定了基础。

全民参与“除四害”

1955 年 11 月中旬，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华东、中南、东北和华北 15 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，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，并将谈话内容与他的若干思考归纳成了《农业十七条》，其中第 13 条是“除四害”，即在 7 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（及其他害兽）、麻雀（及其他害鸟，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，尚待研究）、苍蝇、蚊子。

1956 年 1 月 25 日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下发了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纲要》），在《农业十七条》的基础上有所扩充，内容增加到 40 条，其中第 27 条关于“除四害”的表述为：从 1956 年开始，分别在 5 年、7 年或者 12 年内，在一切可能的地方，基本上消灭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。此《纲要》是一份关于农业生产发展前景的十二年规划，而“除四害”从《农业十七条》开始就位列其中。其运动提出的初衷，不仅是为了提高群众的健康水平，更是为了增加粮食产量。

《纲要》公布后，中央和地方各相关部门不甘落后，纷纷要求提前完成任务。在“除四害”问题上，卫生部很快制定了《关于除“四害”和消灭疾病的规划》，要求在 1957 年内城市和工矿地区做到基本无鼠，农村先创造无鼠典型村，四年内达到每村十公里范围内基本无鼠；草原牧区七年内也达到基本消灭老鼠。1956 年内，做到城市和农村一公里内无雀；二年内城市和农村周围三四公里以内基本无雀；三四年内基本消灭麻雀。农业领域的“跃进”思维在国民经济的各领域蔓延开来，工业领域各部门也制定了若干不切实际的指标。

这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。在 1956 年 1 月的一次会议上，他提出要使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、实事求是的计划，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。他要求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要对不合理的指标“压一压”。在周恩来的领导下，经济领域的“反冒

进”工作逐步展开。这样，“除四害”运动在“反冒进”时期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。

1957 年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（修正草案）》，这实际上成为发动农业“大跃进”的纲领。修正后的《纲要》在“除四害”表述上也有变化：从一九五六年起，在十二年内，在一切可能的地方，基本上消灭老鼠、麻雀、苍蝇和蚊子。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，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，可以不要消灭。

1958 年 2 月 12 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联合发出《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》。2 月 13 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在发表这份文件的同时，还发表了题为《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“四害”》的社论，提出了“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‘四无’之邦”的目标。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“除四害”运动很快进入高潮。

各级党政负责人亲自挂帅领导“除四害”运动，他们甚至同群众一起打扫马路、灭蚊灭蝇。中南海驻地的党政机关每周腾出一定时间，暂停日常的行政工作，高层干部亲自自动手清扫卫生。大人和孩子都被组织起来，铲除杂草，填平户外的脏水坑，使孑子没有孳生的环境。每户人家还要喷洒药剂，毒杀老鼠、苍蝇。各单位划片、分工负责，在统一时间里点六六粉熏蚊子。考虑到中南海的特殊办公环境，捕杀麻雀时，没有使用鞭炮，而是用杆子敲打脸盆。陈毅的女儿陈珊珊回忆，也许是由于生活在中海，常常要考虑种种规矩，孩子们几乎没有这样毫无拘束、淋漓酣畅过，所以大家都异常亢奋。大家拿着杆子、脸盆赶麻雀，麻雀已经在视野里消失了，可孩子们还是兴致勃勃地敲脸盆。

以科学研究为职责的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情况。在力学所北边的三星铅笔厂附近，有一块麦地。钱学森和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实习生谈庆明一起，每人带一根顶端系有红布条的竹竿，到麦地里轰麻雀，不让麻雀停下来休息。麻雀心脏很小，老是飞个不停，就会掉下来死掉。

为了赶上和引领形势，不少地方连续修改“除四害”的时间表，目标时间不断缩短。1958 年，北京将“除四害”的期限定为两年，

河南定为 3 年，江苏定为 4 年，有的县市甚至定为一年乃至几个月。

运动中，有的地方学校停课，工厂停工，商店停业，机关单位也停止了办公，妇女、老人、儿童都被动员起来。大街小巷贴满了“除四害、讲卫生”“深入开展爱国生运动”等标语。居委会负责辖区内居民的清洁卫生工作，每户的木家具都要搬出去用水洗刷，房顶的屋梁和木椽要搭上梯子爬上去洗得看见木头原色，总之，要做到上下左右前后“六面”光。

“除四害”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。比如，灭老鼠，有“掏窝”“水缸捕鼠”“调墨油粘鼠”“碗、桶、面盆扣鼠”等。北京一位小学生还发明了一种灭鼠的奇招，就是把老鼠逮住，往肛门里塞粒黄豆，再用线缝上，放回窝里，它拉不出屎来，就能把一窝老鼠都咬死。当然，放走前一定要把老鼠尾巴割下来，因为尾巴是用来统计战果的。

“除四害”运动中，涌现出了很多“英雄”“能手”。安徽巢湖市的工人顾友昌，仅 1957 年就消灭老鼠 2660 多只、麻雀 4728 多只、苍蝇 90 斤（当时每斤 16 两），挖蛹 25 斤 10 两、蛆 31 斤。武汉市安静街 72 岁的老太太蔡月英，三年如一日除“四害”，消灭了 330 多只老鼠、240 万只苍蝇。此外，北京龙潭街道有 85 岁的“麻雀常”常老太太；河北定县面粉厂共青团支部书记王景贤，一枪打中 6 只麻雀的绝技，传遍全县；懂鸟语、识鸟性的彝族土专家李德发，用 4 种鸟、11 种不同的声音，捕捉了大量的麻雀；长沙 6 岁的小英雄蒋建国，3 年捕蝇 14 万多只。

文艺作品也紧跟主题，与时事相连。有人编写了《除四害讲卫生三字经》，有人写了“除四害”儿童歌曲《打麻雀》。诗词、歌曲、科普文章、漫画等迅速涌现，报纸、广播也大作舆论宣传。

给麻雀“平反”

麻雀是怎么成为“四害”中的老二的？

毛泽东在起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，听到一些地方反映“麻雀成群，祸害庄稼，一起一落，粮食上万”。毛泽东出身农村，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于是决定麻雀同老

鼠、苍蝇、蚊子一起，作为必须除之而后快的“四害”之一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1958 年全国共捕杀麻雀 2.1 亿余只。但不久恶果出现了，1959 年春，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，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了。

一些科学家开始要求为麻雀“平反”。1956 年秋，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，召开了一次关于麻雀问题的讨论会。几位科学家作了发言，认为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，但更多的时间是有利的，反对消灭麻雀。

1959 年上半年，针对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展了纠“左”工作，知识界沉闷的气氛也有所缓和。以郭沫若为首的一批历史学家发表文章为曹操“翻案”。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趁势说，既然曹操可以“翻案”，麻雀为什么不能平反？

1959 年 11 月 27 日，中国科学院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，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，写了《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》，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。随《报告》附送了一份《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》，《资料》共 3 个部分：一、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；二、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；三、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，扼要介绍了朱洗、冯德培、张香桐和郑作新 4 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。毛泽东看到报告后批示：各同志，这个报告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给与会者。

1960 年，由有关国家机关和科研单位人员组成、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部主任童第周任负责人的“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”成立。在协调小组开展工作时，毛泽东在 3 月 18 日起草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》中提出：麻雀不要打了，代之以臭虫，口号是“除掉老鼠、臭虫、苍蝇、蚊子”。

毛泽东尊重科学尊重历史，收回了灭雀的命令，虽然这个过程显得长了一些，但不管用什么形式纠正自己的失误，总是令人高兴并受人敬重的。一些生物学家从 1955 年冬开始为麻雀的命运而抗争，在 1960 年春成功为麻雀“翻案”，他们为了真理敢冒风险、锲而不舍进言的精神难能可贵，历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功勋。



当年，孩子们捞子子，灭蚊子